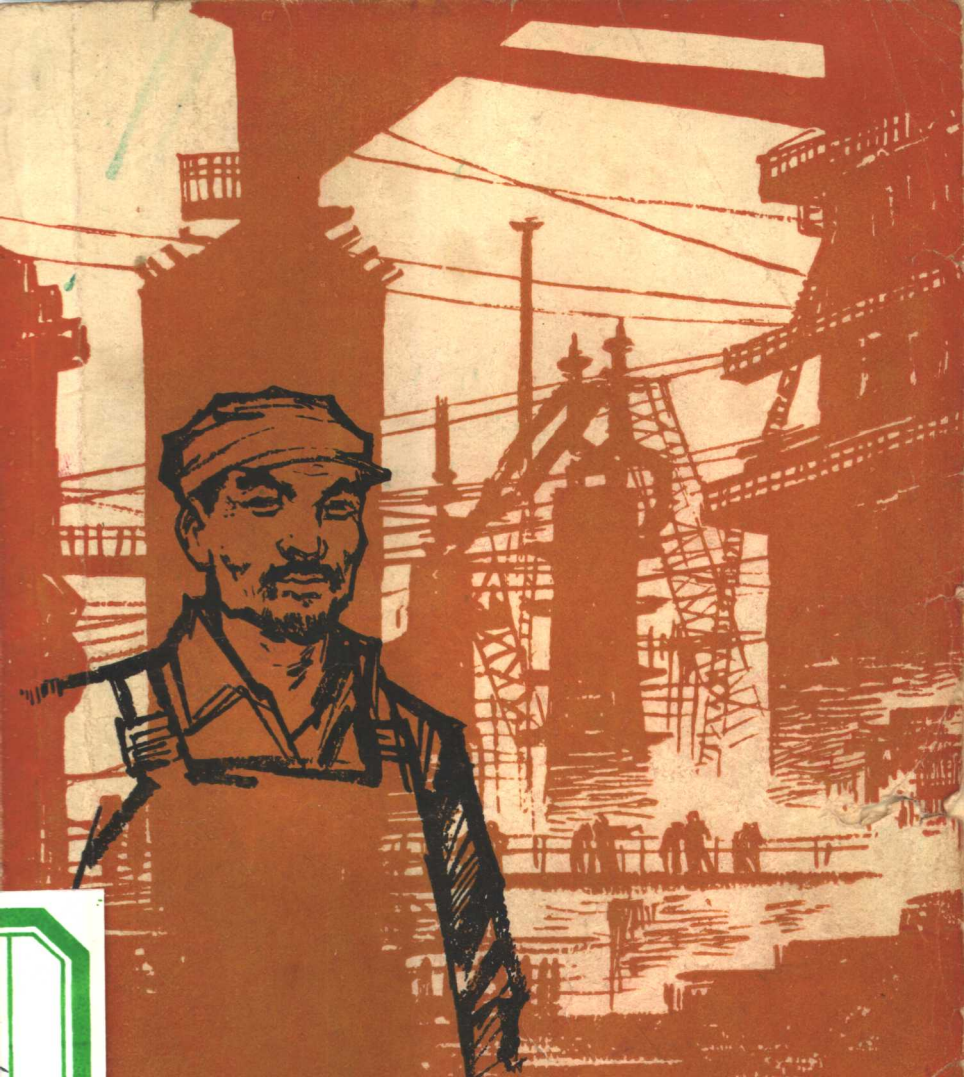


忆苦思甜话当年

群众出版社

忆苦思甜话当年

群 众 出 版 社

1964年·北京

插图：张培力

群众出版社编辑、出版

(北京东交民巷14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00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·全国新华书店经售

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书号(总)201(文)125 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3 10/16

1964年6月第1版 1964年6月第1次印刷

字数 75千字 印数 1—80,300册

定价(4) 0.30元

內 容 提 要

这是一本工人家史。口述者用自己的亲身经历，控訴了地主、資本家、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們的罪恶。解放前，工人兄弟在帝国主义、封建主义和官僚資本主义这三座大山的重压下，经受了敲骨吸髓的剝削，受尽了辱罵、鞭打和摧殘，生活不如牛馬，終日掙扎在死亡綫上。在党的领导下，经过了长期的斗争，劳动人民終于打碎了沉重的枷鎖，获得了解放，过着幸福的生活。过去的仇恨，激励着他們更加热爱新社会，积极建設社会主义，并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。这些忆苦思甜的文章，对年青的一代有着很大的教育意义。

目 录

我这一家人·····	1
血泪仇·····	11
说说我的“两死一活”·····	17
地下奴隶·····	23
我真有千言万语要向毛主席倾吐·····	30
虎口夺生·····	38
在帝国主义开办的厂子里·····	51
九死一生·····	56
搬运工人的血泪·····	61
过去作牛马 今天是主人·····	69
从地狱到天堂·····	74
记住这血仇泪恨·····	83
我在旧社会的遭遇·····	92
“小鬼”造反·····	103

我这一家人

沈阳毛织厂工人 刘 蓮子

我的老家在山东省威海县，爸爸是渔民，一辈子受尽渔霸的压榨欺侮，一次出海遇到风暴，连人带船都没有回来。为了活命，大哥也走上父亲打鱼的路子。他白天黑夜干，一家人还捞不上一顿粥吃。一个大雷雨天，大哥不忍心看着一家人挨饿，冒着暴雨去打鱼，谁能想到他刚走到码头就被电死了。

一家人生活的担子又落到二哥身上。那时他年纪小，体格弱，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？他也只得去打鱼。他力气小，又不会干，成天成天打不上鱼来。弄不到吃的不说，渔霸还逼着缴船租网租。二哥又气又急，心火上攻，闹起眼病来，疼得他在床上来回滚，脑袋直往墙上撞。那年头，穷人哪来钱治病？日子拖久了，黑眼珠慢慢变成白色，二哥成了瞎子。从此，他再也看不见妈妈，看不见我们了。

在威海日子实在难过。看人家闯关东，二姐、三姐就跟着一个乡亲到了奉天（沈阳）。妈妈带着二哥、小哥和我守在家里，天天挖野菜吃。妈妈看看这个，摸摸那个，都黄得象蜡，瘦得象柴。“得另打主意。”妈妈一个人叨咕着。她把家里的东西归拢归拢，嘱咐二哥先在家等信，便领着小哥和

我，到奉天找三姐。

东問人，西打听，好容易找到了“奉天制麻株式会社”（即麻袋厂）。媽媽向看門的说了多少好话，才把三姐找了出来。一见面，我楞住了，这是我的三姐嗎？原来圓圓的脸，变得枯瘦焦黃，一对灵活的大眼睛变得呆滯滯的。不见三姐才一年，她怎么变成这副样子！三姐看見我們，先是欢喜，随后就发起愁来，低声说：“你們怎么也来到这个陷人坑！”从三姐那儿，知道二姐转入另一个工厂，后来結了婚，随同姐夫去大連了。

明知道日本鬼子的麻袋厂是个进得去出不来的地方，也只得睜眼往里跳。三姐做工連自己都养不活，哪里还能顾得我們三个！求了多少人，費了多少口舌，才准我們进麻袋厂干活。我那年才九岁，站起来比桌子高一点，就开始了活地獄一样的童工生活。

我还清楚地記得头一天上工的情景：一个滿脸橫肉的大胖子，領着我們走过一座座屋子。另外一个中等个男人，帶着我进到准备車間。一进门，轰隆轰隆的机器声，震得我头发昏；屋里一股腥臭味，熏得我直想吐。我一眼看見三个和我差不多大的小孩，在吃力地往机器上举大线轆轤。我越看越害怕，正在发楞，那中等个的男人大声罵我：“你是死人？站着干啥？好好跟他們一起干！”我这时偷偷瞅了瞅他，这个人大約三十四五岁，滿脸連鬚鬍子，戴頂黃色的大沿帽，上面有两道紅杠，穿一双皮靴子，手里拿着一根二尺多长的藤棍。他的两只眼睛瞪得圓圓地狠盯着我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他就是我們的工头，名叫王国晨。

提心吊胆地干了几天，每天十二小时活，累得我腰酸腿

疼。这一回，摆麻穗子，一捆少说也有二十斤。我往下拿够不着，一下弄散了。王工头象恶狼似地扑过来，不由分说，朝我腰上狠狠一脚，我一个踉跄跌出去好几步远，还没等我爬起来，一阵乱棍象雨点一样落在我头上。从此以后，打罵不离我的身。头上鼓满肿疮，身上尽是鞭痕，睡觉时，怎么躺也睡不稳。白天受了气挨了打，晚上见了媽媽就吐吐苦水。媽媽含着眼泪一边听，一边撫摸我的头，我常常哭着说着在媽媽怀里睡着了。后来，我发现媽媽、三姐、小哥和所有的工人，脸上手上都带伤，才明白原来他們也一样挨打受气，我就再不向媽媽訴苦了，眼泪直往肚子里咽。

挨打、受折磨，是为了吃一口飯。可是，我們那时吃的又是什么呢？一年到头是橡子面、霉高粱米、臭豆餅、烂倭瓜。就是这些，也很难吃饱肚子。媽媽脚小，走路慢，常常是等我們一家人聚齐了赶到食堂，干的早就沒有了，只剩漏鍋水似的豆餅湯，上面还浮着一层黑机器油，舀一碗閉着眼睛灌进肚子，比不吃还难受。但不吃又怎么办呢！我們住的号子（宿舍），夏天屋小人挤，气味难聞；冬天象个冰窖，牆上挂滿冰霜。躺在冰凉的砖炕上，我和媽媽、三姐三人合盖一条薄棉被，冻得牙齿直打架。每天起床，腿脚都冻僵了，不能迈步，要扶着炕沿遛一圈才緩过来。现在，我身患比較严重的关节炎，就是那时做下的病。说到穿衣，那更别提了。几年做不上一件新衣，破得不能再补了，就用麻把窟窿扎上，看着真揪心。

一家人落到这般田地，万恶的旧社会还不放过我們，灾祸又一桩接一桩临到我們家。

在麻袋厂做了几个月。有一天，我和媽媽都是夜班，白

天肚子餓得咕嚕咕嚕叫，躺在炕上睡不着。忽然，聽見号子外吵吵嚷嚷，有人喊：“找关里来的老太太！”媽媽一骨碌爬起来，嘴里叨咕：“可別是瞎子找来呀！”娘儿俩赶到厂門口，那儿围了一群人，舍监正在用皮鞭子往一个人身上抽，一面罵：“瞎子不去死，跑这来找魂！”那人拄着棍，跌跌踉踉地閃躲。“是瞎哥！”我的眼睛尖，連忙和媽媽跑上去求舍监住手。媽媽扶着瞎哥，我在后面跟着，走到厂子外，找块石头坐下。瞎哥和媽媽說一陣哭一陣，我也跟着嗚嗚哭。瞎哥仅有的一点钱和东西都在半路上让人騙走了，几頓沒吃飯，媽媽向別人借点钱，让他先买个餅吃。舍监不让瞎哥在女工号留宿，瞎哥只好走了。几天后，瞎哥又来一次，这回更不象人样了，脸上身上全是泥。他摸着媽媽的手说：“娘，我再来让你看看。我是个废物，別惦着我了，好好养活弟弟妹妹吧！我这回走，到哪算哪，死了你也別难受……”媽媽捂住瞎哥的嘴，说：“別說瞎话，慢慢想办法……”瞎哥又把我拉到跟前，摸摸我的脸。然后慢慢站起来，拄着棍，一步一跛地走远了。媽媽象傻了似地站在那儿，瞎哥的影子都看不见了，她还站着不动……

瞎哥走后，再也沒来过。听人说，臭水沟里死了个瞎子，旁边还有根棍。媽媽一句话沒说，象丢了什么，常常坐着发呆。

就这样又过了几年。有一天，天刚转冷，下着小清雪，我在車間干活，聞着一陣陣烟火味，大家正在奇怪，忽然小哥慌慌张张撞进来，冲着我喊：“軟麻車間着火，咱娘熏死了……”“娘！……”我扔下活就跟着小哥跑，工头一把拽住说：“死了个老太婆，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！你走了，活誰干？”

工头真是吃了秤砣，铁了心了。后来，我趁他不注意，一转身溜出了車間。

媽媽已经被抬到車間外边，披头散发，灰色罩衣烧了个角，脸铁青的，眼睛半睁半闭。我和三姐小哥呼天搶地喊娘叫媽，媽媽一动也不动。日本鬼子領着工头来了，直劲攆我們走，说在这儿影响大家干活。还是一位好心的老大爷，告訴我們媽媽也兴沒死，叫烟憋住了，放放烟可能緩过气来。几个人把媽媽抬到空气流通的地方，掰开她的嘴，又掐脖子，又推搡，果然一团团黄烟冲出来，足有半个钟点，媽媽才喘过一口气来。可是醒过来后，神志老不清醒，好几天不认识人，总



比划着喊：“火，火！”

后来，我才知道，軟麻車間着火那天，工人們都急着往外跑，媽媽当时吓傻了，站着不动，看人跑光了，她才想到逃命。就在这时，工头来了，他怕火蔓延到別的車間，命人把車間的門一扇扇都关死了。軟麻車間里滿屋黑烟，媽媽推推这扇門，晃晃那扇門，可着嗓子喊：“快開門，还有人哪！”“開門，放我出去啊！”工人央求工头開門，心比蛇还毒的工头，用鞭子抽散人群，恶狠狠地说：“死个老太婆有啥？火烧到別的車間你們担得起？”人們听见媽媽把車間几扇門晃遍了，哭喊声也越来越小，后来沒有了声息。工人們气愤极了，逼着工头把門打开，只见媽媽栽倒在一扇門旁边。

媽媽不能上工，舍监不让捎吃的，我和小哥偷偷带块窝头，都纏在小腿肚上，要不准給搜了去。媽媽稍稍见好，工头几次三番命令她上班，威胁她再不上班就开除。媽媽只好带着病，忍气吞声去做工。气、急、惊、吓凑到一起，她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坏，瘦得不象人形，工头还照常打她罵她。媽媽总说：“穷人什么时候能见青天啊！”可怜她到底沒能熬到见青天那一天，在日本投降后四、五天，就扔下我們死了。

媽媽死了以后，我們这三个孤儿的命运更惨了。万恶的国民党代替了日本鬼子，换湯不换药，工人的生活照旧那么苦，那些工头依旧騎在我們脖子上。在媽媽死了以后，接着遭受不幸的就是我的三姐。在旧社会象她那樣的青年女工，除了挨餓受累以外，还有一层苦难——工头的侮辱。工头对我三姐总是糾纏不放。三姐宁死不肯屈从。工头恼羞成怒，便想方設法折磨她，刁难、找碴，动不动又打又罵，三姐都咬牙忍着。有一次干活时，右手食指叫机器打了，工头不让

去治，要她继续干活。她的手指越来越肿，后来竟有小擀面杖那样粗，手背肿得象馒头。工头怕闹出人命，才让三姐去医院。X光一检查，手指骨全变黑了，只能把食指割掉，否则右手难保。那时的医院，哪把工人当人看，动手术时不给打麻药针，生往下割，三姐疼得死去活来。割完回工厂时，沿路昏倒几次，血不停地往下淌。可是黑心的工头只让休息半天，第二天三姐上班，一边干活，手指一边往下滴血。

三姐在肉体 and 精神的折磨下，后来又得了肺病，大口大口吐血。强挺着又干了一年多，实在支持不了才离厂到一个乡亲家歇着。在她临死前几天，轻轻对我说：“蓮子呀，三姐也要跟着媽媽去了，再沒亲人照看你，你自己要留心身体啊！我听人说过有个八路军，专门帮助咱穷人，你好好等着吧！也许有那一天……”可怜三姐在二十二岁正好的时候，就叫吃人的旧社会吞噬了。

三姐才死，横祸又临到小哥身上。他在街上叫国民党的卡车撞了，左眼上眼皮硬撕了下来，挂到脸上，整个鼻子被撞沒了。厂方说他模样怕人，把他撵了出去。小哥沒处存身，只好躲在破防空壕里，白天拣煤核，换点吃的。我偷着去看他，见他在泥水沙土里爬滚，心里象刀扎一样。

不过短短十几年工夫，万恶的旧社会就夺去了我父亲、母亲、两个哥哥、一个姐姐的生命，害得我和小哥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，骨肉离散，家破人亡。在帝国主义反动派统治下，劳动人民有我们家这样遭遇的，何止千万！这不是一家的不幸啊！

我在絕望中，常想起三姐说的八路军，不过，八路军是什么样子的呢？他們又在哪呢？

我盼望的这一天到底到来了：1948年11月，解放軍进了沈阳城，工人解放了，翻身了！我們工人开始过真正的人的生活，再不是任人欺侮的牛馬。不久，我参加了厂里组织的歌詠队、秧歌队，活了十六岁只知道抹眼泪的我，生平第一次放开喉嚨唱歌，挺起腰板扭秧歌。

这些无恶不作的工头，在解放后，装出一副副老实样，有时还在工人面前讨好。我們早看清他們的狡猾和恶毒，誰也不去搭理，恨不得咬他們几口才解恨。共产党、人民政府真懂得工人的心情，在1951年鎮压反革命运动中，王国晨和另一些坏蛋被依法逮捕，还开了千人以上的公审大会。那些胡作非为、作威作福的工头，在站起来的工人面前，吓得面如土色，低着头瑟瑟发抖。工人一个接一个指着恶工头的鼻子，控訴他們压迫、欺凌、污辱工人的罪行。我也在众人面前，大声说出了积压在心底的刻骨仇恨，替死去的亲人伸冤报仇。全场喊起响亮的口号：“打倒工头，讨还血債！”“工人階級万岁！”“共产党万岁！”“毛主席万岁！”

万恶的工头被枪毙了！反动統治階級被打倒了！人民掌握了政权！我們成为国家的主人！

这十五年来，随着国家一天天繁荣富强，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生活一天比一天好。自从共产党的干部到沈阳麻袋厂的第一天起，我，刘蓮子，名字沒改，人沒变，工作的地方沒調換（我1962年4月才到沈阳毛织厂工作）。但是一切都变了，翻天覆地般变了。工厂党的領導干部、厂长、妇女委員都亲切地叫我：“小蓮子，小鬼！”见我年紀小，身世苦，特別的关怀我，照顾我。媽媽是最疼我的，可是在吃人的旧社会，她只能用眼泪洗抹女儿的伤痕。而共产党的干

部，替我們穷人撑腰，还教导我們应该怎样活下去。以前，我們忍气吞声，連咳嗽声稍大些都会犯规；如今，我們可以在大会上，在领导面前，提出自己的意见。工厂是我們自己的，由我們自己来管理，每个工人都享受着 he 应得的权利和福利待遇。每天不到钟点，我就急着骑自行车去上班，（再不象以前上車間走一步退两步，最好总也不到达。）上班前，換上洁淨的工作服，下班后，用肥皂洗干净手和脸，心里象揣着一块糖，总是甜滋滋的。几年前，我得了肾炎，厂里让我休息了五个月，想尽办法給我治疗，还常常給我送苹果送鸡蛋。这种时候，我怎能不想起屈死的三姐？如果在新社会，她何至于死？

解放不久，我就和同厂的一个工人結了婚，我們一同受过旧社会的苦。婆婆也曾在旧麻袋厂做过工，都是一个根子上的人。“家”就在麻袋厂宿舍里。墙刷得白白的，冬天炕烧得热乎乎，鋪的盖的穿的用的逐年都要添置一些。当我们坐在热炕上，谈起冰窖似的号子，三人合盖一床薄被的狭炕，令人不忍耳聞的呻吟，不忍目睹的惨状，哪能相信这些情景原来就发生在这些宿舍里！

我有三个孩子，大儿子今年十四，二女儿十岁，小儿子六岁。他們生长在幸福的毛泽东时代，和我們姐妹兄弟的童年不能比。

我的媽媽一輩子生了三男四女。有儿有女，該是有福的。然而，哪个孩子給她带来过福气呢？她自己劳累一生，沒有过一天舒坦日子；她眼看着孩子們一个个受罪惨死，没有办法保护。旧社会福字不属于穷人。而现在，我当了三个孩子的媽媽，完全享受到作媽媽的权利和幸福。从怀孩子那天起，

就受到种种照顾，生孩子有近两个月的休假，工会送来鸡蛋，同志们来贺喜。在旧社会，生孩子是女工最大的不幸，哪里还有什么喜？生了孩子，当妈妈的就要被开除。好容易想法瞒过去了，把孩子偷偷送来喂奶，给工头看见了一脚就踢老远。我们现在能按着规定时间去哺乳室喂奶。我知道，幸福不是孩子们带给我的，是共产党、毛主席把穷人救出苦海，我才有了和我妈妈完全不同的命运。

党也救了我的小哥。解放后，他去大连一个残废教养院，在那里一个工厂做工，为社会主义建设尽力。他还修补了面容，生活得很幸福。

一句话，我得到了一个新中国的工人所能得到的一切。我生活在幸福中，过着蜜糖一样的日子。但是，我并没有忘记过去。我怎么能忘记过去呢？在我的一家中，我是最幸运的，我多么希望能够让那些受了一辈子苦，死不瞑目的亲人也来尝尝今天的幸福滋味啊！他们被无情的旧社会吞掉了。这是我们劳动人民的血海深仇啊！

在新社会生长的人，很难想象一个家庭的遭遇怎么会这样惨，怎么那么多倒霉事都落到一个人身上。但是，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，这就叫旧社会哪！现在，我有一个幸福的家庭，我要让孩子们都知道妈妈小时候的“家”是什么样的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刘蓮子一家的变化，让大家永远不忘过去，更加热爱今天。

（吳秀琴 整理）

血 泪 仇

退休老工人 敬文升

1945年，我在河南省漯河华信烟厂摇机。烟厂的掌柜是毛金修、閻洪宾、袁明庆，还有一个工头叫胡文甫，外号叫胡大胖子。那时工人们为了混碗饭吃，给他们没明没夜地干。我记得这一年，快过年的时候，掌柜只给每人发了一块多钱。

这年腊月，人们都在准备过年，烟卖的特别快，资本家看到有利可图，就叫胡大胖子监工，让工人白天晚上连着干。胡大胖子白天睡大头觉，夜晚掂着棍子到厂房来回转，谁要是一打盹，劈头就是一棍。那时候我是炕烟工。唉！提起炕烟，那才真是活受罪。那时候炕烟用的是柴炭，炕房内象火山一样，燎得人喘不过气来。正月二十三日这天夜里，风很大，天阴森森的，当时，我已经昼夜不停地干了很多天，又累又热，头轰轰的，走起路来光想晕倒，饭也吃不下去。我实在是支持不下去了，就壮着胆子去向掌柜请假。我说：“毛掌柜，我病的实在不能再支持了，想请个假去看看？”他听说我要请假，两眼一瞪，说：“你请假谁替你炕烟！要看病你找个人来替你！”

假没有请准不说，反而当着许多人把我痛骂了一顿，说

我不好好干。当时，我敢怒不敢言，两眼含着泪，拉着两条沉重的腿又回炕房去了。这时已是夜里十一点多钟，我一进炕房，大堆炭火烧的正旺，一股热气向我扑来。我走了几步，觉着天旋地转，眼冒金星。我刚想离开火炕，谁知就在这个时候，便晕倒在火堆上了。清醒过来后，我一边挣扎着往外爬，一边呼喊着重人呀！救人呀。因为起了大风，加上烟机

